

江南，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的栖心之所。

江南，不止于一个地理概念，千百年来，源远流长的江南文脉，留下无数值得传诵的经典名篇。

9月28日成功举办的走读江南·中华经典传诵活动，给了我们一个契机，通过8小时不间断直播的形式，在南京、镇江、常州、无锡、苏州五座江南名城，重温经典，致敬先贤。其中，著名作家叶兆言、朱辉、评论家何平进行了一场以“文学中的江南势力”为主题的精彩对谈，为我们梳理了江南文学的发展脉络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王凡/文
马晶晶/摄



扫描二维码
观看视频



何平(左一)、朱辉(左二)、叶兆言(左三)对谈“文学中的江南势力”

风骚独领，文学中的江南势力

1

江南，一个特别有温度、有格调的词，提起它，我们不禁会想到江南的富足，江南的美丽，以及江南的韵味。而所有的这些美好，都有赖于一代代江南文人学者对江南文化的精彩描绘和记载。

叶兆言曾在一篇《江南文人》的文章中梳理过江南文脉。江南的文明是从东吴开始的，东吴是我们文明的源头。在东吴之前，整个江南地区基本上都是在蛮荒年代，那时候江南到处都是沼泽地，人烟稀少，关于它的文字记录的历史，都是虚无的，更多的是一些传说。

江南真正形成气候是在东晋，也是从那时开始变得富裕。不过，东晋的江南文化其实是北方文化。永嘉南渡，大批士子拖儿带女，一下子全跑到江南来了，江南像样一些的文人最初都是北方人，因此，江南文人骨子里还是北方文人。魏晋风度历来是江南才子们仿效的样板，是他们精神上的源头。

魏晋时期是一个文人辈出的年代，既有建安七子，又有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，这些辉煌的人和事，其实都发生在北方。只是南渡以后，北方的文人成了南方的文人。“既然是失败的北方，此时就谈不上什么强秦雄视天下，也没有一点点西汉的恢宏广大，聊以自慰的一点魏晋风度，因为接二连三掉脑袋，此时迅速堕落变质，只剩下一些空谈和装疯卖傻。”

六朝时期，这种魏晋风度在文学上延续，但在叶兆言看来，骨子里其实就只有软弱两个字，史家所谓“气格卑弱”。“江南文人所继承的，正是这种颓败的北方文人的传统。古老的吴越文化，究竟什么样子，江南文人其实并不清楚。”

2

“江南文学是在南宋以后变

得特别厉害。”叶兆言说道。

在唐宋时期，唐宋八大家提倡的是古文，反对骈文，矛头直指六朝文风。唐宋八大家中，以北方人居多。

随着南宋定都杭州，汉文化的中心又一次完全转移到南方。江南文人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来了，有人对《宋史》中的儒林人物进行统计，浙江一跃为首，遥遥领先于其他各省。不仅是儒林，当宰相的、写词的、绘画的，都是第一。

尽管宋朝南迁和西晋东移，原因差不多，结果也有很多相似，但江南文人在南宋时期，并没有走六朝文人的老路。江南文人中，既出秦桧，也出陆游这样的爱国诗人。宋以后的江南文人，差不多成了一支职业军团。真正继承唐宋八大家衣钵的传人，仍然出在江南。明朝的归有光、唐顺之，为维护古文运动的正宗地位，不懈努力，终于成了地道的八大家弟子，成为后来风行一时的桐城派的师宗。

江南文人的再一次辉煌是在明清。科举中，他们如鱼得水，表现卓著。在明代，浙江和江苏能入《明史》的列传人物，占据了前两位，进士及第人数分获第一和第三，中状元的人数占第一第二。到了清朝江浙两省势头更猛，尤其是江苏的苏南，已明显超出自宋明以来，一直排名于前的浙江。清朝一共只有112个状元，江苏状元有50人，而苏南的仅苏州一府，就出了25人。科举得意，就其根源，还是和江南的经济繁荣分不开。

不过，在叶兆言看来，江南文人引以为自豪的，绝不是出了多少个状元，封了多少名宰相，有很多人得意于仕途，驰骋大大小小的官场，也不是因为有了东林党，有了复社，出了很多风流才子，潇洒于秦淮河畔，画舫笙歌，酒食争逐。江南文人骄傲是因为有了顾炎武，有了黄宗羲。在这样的乱世中，依然能有几位保持头脑清醒的文化人，江南文

人才不至于一下子完全被人看扁。因为有了顾炎武和黄宗羲，江南文坛一下子增加了许多亮色。

3

顾炎武著作等身，为后人所熟悉的有《日知录》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《肇域志》《音学五书》《韵补正》《亭林诗文集》等。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这句话最早便是在顾炎武的《日知录·正始》中提出的。

叶兆言说，顾炎武的学识和宋朝开始流行的理学不一样，不是如程门师徒雪夜相对静悟出来的，而是靠自己的双脚，脚踏实地到处调查研究，然后才变成文字著作。顾炎武曾批评过当时的信口空谈，认为世人所谈论的时髦理学，其实只是一种禅学，不货真价实地取之经书，而是依靠一种偷懒省事的“语录”。利用前人的只言片语，作出后人自说自话的全新解释，这种学风正是顾炎武力图要改变的。

顾炎武的学问人格，也被清统治阶级相中，清政府逼顾炎武出来做官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他拒绝一切诱惑，就是不肯出山。冒杀头的风险，他大讲经世致用之学，奔走南北，与明遗民在一起，随便发表政见。清政府不仅不加以干涉，还由当时的陕西提督张勇的儿子出面，向顾炎武请教学问，并想刻他的著述。

“顾炎武为江南文人做了最好的表率，是后来一切读书人的楷模，江南文人的骨气、硬气，在他身上体现，值得后辈景仰和学习。”叶兆言说。

当然，除了顾炎武所代表的江南风骨之外，评论家何平认为，明清时期江南文学还有抒情的一面，讲究生活的艺术和趣味。晚明的张岱，清代的袁枚、李渔、沈复的作品，都有江南风味。而作家朱辉认为，五四之后的鲁迅、张爱玲、钱钟书，他们也是江南文人的代表，特别是鲁迅，除了刚毅之外，他的江南柔情常常

被人忽略。

4

江南文学在今天依旧鲜活。1990年代，中国当代文学阶段性地进入了先锋文学阶段，叶兆言、苏童、格非、余华，一批有才华的江南作家成为先锋文学的主力军，他们形成了一个江南文学圈，或者说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江南势力，也成了中国文化史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。

叶兆言说，这是一种巧合，他们几位恰好所属的区域都是吴地，而他们的创作又恰好都被北方所认可。从不被人注意、孤独写作，写具有一定探索性的作品到成名，叶兆言提及，这过程呈现出一种“先锋”的姿态和心态，先锋并不是一种时髦的文学流派。先锋一旦成功了，就消亡了。

何平认为，1930年代文学中心南移，纵观中国文学生态，确实存在着一种江南势力，这是以北方为参照系的，相比北方喜欢巨大的长篇小说，像叶兆言《一九三七年的爱情》、苏童《黄雀记》、余华《活着》等，都不是巨大的，有一种江南独有的审美，不遵守文学教条，拓展一些新的可能性。当然，除了先锋文学之外，江南还有陆文夫、高晓声、汪曾祺、毕飞宇这样的一类追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作品，也不应忽视，而葛亮这样的一些作家的出现也代表着一种江南的“新势力”。

朱辉表示，先锋文学在文坛横空出世时，形成江南势力，是因为江南文化积淀深厚，此地多出文人，得风气之先，对外来的文化有一种包容和开放的姿态，如新感觉派。另外，江南人有一种“精益求精”的特质，在创作上不断磨砺。

而对于江南文学的未来，叶兆言“预言”，机会更多的会属于外地人。从江南出发，最终会超过江南。



叶兆言



何平



朱辉